

论中共南方局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

王忠事

内容提要 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是党的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时期,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积极开展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努力发挥他们支援抗战的作用,积极做好上层人士的工作,支持他们抵制官僚资本的掠夺和压迫,并发动他们参加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争取民主政治的斗争,为这个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 抗日战争 中共中央南方局 周恩来 民族资产阶级 统一战线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是抗日战争初期党中央驻国民政府陪都重庆的派出机关。在国统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肩负着中共统一战线重任的南方局,在维护国共合作的同时,努力争取广大中间势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同盟者,对各界、各方面朋友,其中包括民族工商界,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团结了这支中间势力的重要力量,壮大了进步势力,对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以及推动和平民主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高度重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坚决贯彻党中央争取时局好转的方针。

抗战爆发后,在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的高潮。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合作关系比较正常。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的政策逐渐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尖锐复杂化。中共中央正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中国抗战出现了中途妥协和内部分裂两大危险,但中日矛盾仍是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争取时局好转的基本方针,即是更加认真的根据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去组织全国一切进步力量,即一切抗战和民主的力量”^[1]。因为“只有国民党内部外部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各种中间势力与进步势力,加强其对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压力,对时局才有好转的可能性”^[2]。1940年3月,毛泽东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并指出:“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中等资产阶级就是除了买办阶级即大资产阶级以外的民族资产阶级。”^[3]

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不仅云集了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各民主党派、科技教育界等方面的高级知识分子,而且集中了大批民族资本家。仅以工业界来讲,抗战爆发后,沿海沿江不少工厂内迁,加上原有的以及新开设的,到1945年底,大后方共有工厂5998家,其中重庆有

1649家,四川其它地方有1158家,其生产量大约要占工业总产值的80%^[4]。它们是战时民族工业的基础,是后方物质供应的重要来源,是抗日救国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贯彻党中央的方针,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就成为南方局统战工作中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毛泽东在致周恩来和叶剑英的电文中指明了南方局肩负这个任务的深远意义:“如果我们能以正确政策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民主方面与我们合作,在国共斗争方面保持中立,则不仅对孤立大资产阶级有极大帮助,且使我们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得以开始在全国注目之地区实现,对于目前阶段整个革命进程是大有帮助的。”^[5]

南方局忠实执行了党中央的政策和指示精神。1940年4月,周恩来从苏联养伤回国,即多次召开南方局会议,研究布置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并决定在南方局统一战线委员会专设经济组。周恩来还指示,经济组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开展民族工商界的工作。皖南事变后,南方局进一步动员所属党组织,依靠广大党员和党外先进分子推动对民族工商界的统一战线工作。

针对有的同志对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意义认识不足的思想,周恩来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抗战形势,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了精辟分析。他指出,不能因为十月革命对资本家的态度,便把我国同帝俄等同起来。沙俄是帝国主义国家,它的资本家不受其它帝国主义的压迫,而且本身就侵略成性,压迫别人。这些资本家大多从贵族和大地主演变而来,他们支持沙皇,在政治上有反革命的一面,十月革命对他们严厉镇压是正确的。而我国资本家不同,既要看到他们和工人阶级矛盾的一面,又要看到他们受帝国主义和四大家族经济压迫,同时还要受国民党政府政治压迫的一面。他们在一定条件下会同情和赞同革命。对外,拥护抗日,赞成团结抗战;对内,要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赞成宪政运动。包括他们在内的中间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进步势力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周恩来进一步强调,革命斗争不只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也至关重要。他指出,战时的重庆和大后方,民族资产阶级是中间势力的重要部分,是南方局统战的一个重点。周恩来的分析,统一了南方局内部的认识,为推动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指明了方向。

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全过程看,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政策,审时度势,充分运用统一战线这一法宝,争取团结了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中间势力,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分裂倒退活动、维护全民族持久抗战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二 努力发挥民族工商业的作用,鼓励积极生产,支持抗战。

抗战爆发后,我国海岸被封锁,外援断绝,沿海工业区沦陷,中国抗战所需的物质主要依靠自力更生,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的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承担着支持抗战的艰巨任务,民族工商业已成为坚持持久抗战的经济支柱。南方局高度重视民族工商业在抗战中的这种地位,周恩来提出要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民族工商业,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同时,南方局对民族工商业的处境和生产十分关心。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以国民参政员的名义多次前往渝鑫钢铁厂、豫丰纱厂、合作五金厂、顺昌机器厂、天原化工厂等企业参观视察,深入了解后方民营工业的生产情况。为了表彰这些民营企业克服困难、努力生产、支援抗战的爱国精神,南方局领导人在参观五金合作社时,还分别为该社题词:“供给前方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合作奋斗,发展生产。”“在极艰难的条件下奠定新工业的基础。”这些题词,肯定了民族工商业在抗日救国中的重要地位,指出了民族工业前进的方向,给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以极大的鼓励。后来,周恩来又为渝鑫钢铁厂题词:“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

初步的基础。”题词高度赞扬了渝鑫厂为支援前方抗战和发展我国民族工业所作出的贡献,这对工商界是一个巨大的支持。

对资本家的思想工作,周恩来坚持既要尊重他们的利益,又要引导他们深明大义,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担负起责任。他对“猪鬃大王”古耕虞的帮助和教育,是南方局争取民族资本家的生动范例。当时,苏美英急需猪鬃,提出,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要中国每年供应盟国3至6寸的长鬃10000担。周恩来在与古耕虞为代表的出口商座谈时指出,猪鬃是战备物质,对战争的胜负起着一定的作用,国民党种种不合理的阻碍生产的措施应当改进,使猪鬃商能够维持生产,有一定的利润。同时猪鬃商在战争时期也不应要求过高的利润,要保证供应,支援抗战。他希望出口商们高瞻远瞩,抗战胜利后,国家要建设,还要发展猪鬃的生产和出口,以换取外汇,民族工商业还有广阔的前途。周恩来的教导和勉励,使出口商深受教育,古耕虞经营的四川畜产公司除了以四川为基地外,还在黔、滇、陕、甘、湘、鄂等省收购加工,担负了当时猪鬃生产和出口的主要任务,满足了盟军的需要。

南方局还通过《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热情报道民族工商业艰苦奋斗的种种活动,《新华日报》及时刊登了周恩来为民营工业的题词,广大工商业者深受鼓舞和鞭策,使他们感到民族工商业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越来越多的人逐步靠拢共产党。

三 积极做好工商界著名人士的工作,晓以民族大义,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

南方局强调统战工作的经常性、计划性。周恩来提倡广交朋友,以诚相待,真诚合作,患难与共。因此,南方局始终注意民族资产阶级各个部分的不同特点,尊重他们的利益要求,采取广泛的接触、交友、座谈和演讲宣传等方式,坚持不懈地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团结了一批在社会上有影响的民族工商界人士,在争取抗战胜利、挽救民族危亡的事业中和他们建立起风雨同舟、和衷共济的关系,使他们从此走上了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

康心如、康心云和康心远三兄弟都是有名的民族资本家,周恩来多次到康家拜访,常常派人送去或寄去材料,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周恩来善于诱导启发,提高他们的认识,在谈话中深刻地指出,复兴中国必须打倒日本侵略者,只有抗日才有出路;有益于抗战的事应当尽心、尽力、尽责,要做有利于抗战的生意人。

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等多次组织民族工商界知名人士集体座谈,通过交心沟通思想。经常参加座谈会的有刘鸿生、吴蕴初、胡子昂、胡厥文、李烛尘、章乃器、吴羹梅、颜跃秋、康心云、余铭玉、吴晋航、卢作孚等一批社会影响大的实业家。在这些座谈中,周恩来要求他们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积极生产,为抗战多作贡献。他指出,中国抗战,主要依靠自力更生、抗战到底,这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他希望爱国的工商业者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策,克服困难,击破敌人的封锁和分化。他坚信,只要坚持团结,抗战到底,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这些充满爱国激情的讲话,深深地感染着广大工商业者。后来许多人回忆说,周恩来的讲话,使大家精神振奋,透过弥漫的浓雾,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他们感到共产党可信可靠,是国家和民族的真正救星,开始认识到跟共产党走不会错。中国共产党与民族工商界最终建立了相互信任、共同奋斗的合作关系,正是从南方局在这一时期所做的大量艰苦细致工作所奠定的坚实基础开始的。

四 支持民族工商业求生存、抵制官僚资本的掠夺和压迫的斗争。

毛泽东深刻地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受当政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所限制”^[6]。在国统区经济上,他们受四大家族的压迫;政治上,他们受国民党的压迫。因此,“在反对国

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将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没有或较少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这是我党争取中间派……的理论根据”^[7]。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对民主进步力量的政治压迫加剧，民族工商业所受的经济压迫也更加沉重。在这种高压下，有许多民族资本家的企业被吞噬了，也有的投入了四大家族的怀抱。在这种情况下，南方局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帮助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反对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的斗争。

首先，分两步帮助民族工商业联合起来，抵制官僚资本，以求生存。第一步先把四川主要的民族资本家刘航琛、卢作孚、何北衡、杨灿三等团结起来。第二步，又联络了云南的缪云台等，共同对抗四大家族。周恩来亲自做了大量工作，他通过聚兴城银行经济研究室主任高兴亚利用工作职务之便，穿针引线，促成刘航琛、卢作孚等实业家的联合。他还先后会见了胡子昂、胡厥文等著名工商界人士，鼓励、支持他们加强团结，抵制官僚资本的掠夺。周恩来还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利用座谈的机会，列举大量材料和事实，有力地揭露了四大家族对民族工商业的敲诈勒索。广大工商业者对周恩来和共产党十分信服，在中共的帮助下，进一步实现了联合，与官僚资本对抗到底。

其次，帮助成立“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为了推动工商界的斗争，南方局批准了经济组提出的把经济机关、企业中进步的资本家和厂店中的职员及理论工作者组织起来，成立“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的建议。“经协”筹备会组成后，提出经济民主的九点主张，反对国民党的经济垄断，受到周恩来的重视，很快在《商务日报》上发表。“经协”正式成立时，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应邀出席大会。会上通过了根据《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精神写成的《对当前经济问题的意见》，其内容击中了国民党政府在经济上反动腐败的要害。“经协”成立后做了一系列工作，对团结民族工商界的进步和中间分子起了积极作用，推动了民主运动的发展。

再次，支持工商界反经济统制的斗争。抗战后期，国统区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物价飞涨，法币贬值，人民生活每况愈下。国民党通过通货膨胀和统购统销巧取豪夺，中小工业受到的掠夺更甚，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矛盾更加尖锐。民族工商界忍无可忍，于是起来反对经济统制。南方局通过《商务日报》不断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的通货膨胀和贪污腐化，支持民族工商业的生存斗争。重庆市商会和贸易业等四公会，公开向国民党要求废除统购统销，《新华日报》随即发表题为《废除统购统销》的社论。后来，又刊登了重庆市商会等团体联名发出的《统购统销何以尚未取消》的意见书，大声疾呼，为民请命，造成了强大的舆论，迫使国民党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南方局经济组还在党报党刊上发表大量文章，描述民族工商业的困难处境，支持他们的公开斗争和正当要求。

此外，南方局还注意支持中小工商业的斗争，帮助他们成立“中小工业联合会”，开展自救运动。“中小工业联合会”从酝酿、成立到各项活动的开展，都在南方局的领导、支持下进行。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特园和其他场合，对“中小工业联合会”作了许多重要讲话，指明其斗争的方向和奋斗目标。董必武、博古、吴玉章、许涤新、张友渔、李澄云等也给予许多具体帮助。党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和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对中小工业联合会的一切重要活动都及时作了报道，同时发表社论、专文，扩大了“中小工业联合会”在社会上的影响。随着抗战胜利和民主运动的发展，南方局又引导“中小工业联合会”把经济利益为主的斗争发展为反内战、要和平、争民主的政治斗争，使之成为一支重要的民主进步力量。

在民族工商业艰难危机的时刻，南方局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体现了共产党和他们风雨同舟、

患难与共的精神,使广大工商业者终于选择了向人民靠拢的道路,从此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争取光明的新中国而奋斗。

五 发动工商界为争取民主政治、建立联合政府而斗争。

1943年下半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也渡过了严重困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而国统区实行的独裁政治和经济掠夺,进一步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日益不满。8月16日,周恩来在延安作题为《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的报告,要求结束国民党的专制独裁政治。南方局根据这篇报告的精神,发动国统区的民主进步力量掀起民主运动,要求实施宪政。

关于宪政问题,中共中央认为:“在国际国内形势逼迫及舆论要求下,国民党不得不于十一中全会允许于抗战结束一年后实行宪政,并允许各地在其种种限制下讨论宪政问题。虽然目的在于欺骗人民,借以拖延时日,稳固国民党的统治。但是只要允许人民讨论,就有可能逐渐冲破国民党限制,使民主运动推进一步。”并指示:“中央决定我党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收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达到战胜日寇与建立民主国家之目的。”^[8]

根据中央以上精神,周恩来提出实行宪政最重要的三个先决条件:“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9]1944年9月,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将宪政运动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从而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得到各党派、团体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拥护。民主运动的兴起,教育和鼓舞了深受官僚资本压榨、处于危机状态的民族工商界,促使他们进一步在政治上联合起来。迁川工厂联合会、川康金融界代表、中华职教社负责人以及同工商界有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黄炎培、胡子昂、章乃器、施复亮等发起组织“星五聚餐会”,讨论宪政,交换对时局的意见。周恩来肯定工商界关心政治是一个进步现象,密切关注这些活动并加以指导。董必武在有500人参加的宪政座谈会第七次会议上发言,支持各民主党派提出的实行民主政治的要求,并指出如果不实行民主自由,中国就将亡国。要真正实现自由民主的中国,就只有实现林伯渠代表中共提出的召开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新华日报》刊登了重庆市商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生产促进会、国贸厂商联合会、中国西南实业协会等六个工商团体联合发表的《对时局主张》和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的《中国工业化与民主是不可分的》演讲,要求实行宪政,厉行民治,呼吁全国团结,争取抗战胜利。南方局主要负责人王若飞以及许涂新、潘梓年等在特园宴请工商界著名人士和经济学家,积极推动工商界投身民主运动。为了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向民族工商界宣传中共的主张,周恩来在西南实业协会发起的“星五聚餐会”上作了题为《当前经济形势》的报告,系统地阐述了中共的政策。他指出,战后工业建设,首先要有和平的局面。中国不但要政治民主,经济也要民主,工业界应派代表参加讨论和平建国方案。他还根据中共“七大”制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阐明中共发展经济的方针,为民族工业指出前进的方向。周恩来的讲话在工商界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对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民主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次报告后,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再次邀请工商界人士座谈,了解他们的想法和征求意见。会上,南方局领导人分析说明了在帝国主义和买办官僚压榨下,中国民族经济不可能得到发展,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正如狼似虎般吞噬着民族工商业。在中国,要求得民族经济的发展,必须首先实现民族解放,实施民主政治。只有结束国民党的政治独裁和经济压迫,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新中国,才是发展